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颠覆传统思维,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同管益忻教授对话

■ 徐伟 杨子健 刘立华

宏观调控要注入新思维

郑新立(以下简称“郑”):迄今为止中国搞了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因为这么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才发展得这么好,世界有目共睹。现在就连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在研究、学习、借鉴中国的模式,美国在最近几年较快突破危机,搞宏观调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借鉴中国经验的结果。经济危机爆发之后,面对这么大的金融危机,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逐步走出了危机。

管益忻(以下简称“管”):从 QE1 到 QE2,到 QE3,美国一再地搞货币量化宽松,并没有搞深层的调整结构。伯克南下台,耶伦老太太上来,购买额还从 750 亿降到 650 亿,但并未调结构。

郑:美国实际上把危机的影响转嫁出去了。

管:债务是转出去了,但他们自己深层结构问题并没有解决。

郑:人家现在有经济复苏迹象,而咱们自己有点受他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搞得政府不敢说宏观调控,一说宏观调控有些人就反对,说政府干预市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两者不可偏废。政府把不该审批的事都交给市场,不要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但是宏观调控还必须得做。

管:其实世界各国都搞宏观调控,也不唯独中国在搞,是吧?

郑:对。就现实作法来说,我们的宏观调控还是从西方学过来的呢。从德国、美国学过来的,当然,学的过程中又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加以创新了。

管: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一个总的形势,总的看法能否给出一个大致的定调? 特别是如何颠覆传统思维,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的问题。

郑:前不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很多专家学者座谈,大家认识上也有一些分歧。两会上记者问总理,我们去年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总理说最大的压力就是经济下行的压力。经济下行的压力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今年的形势证明压力仍然存在。主要矛盾方面还是需求不足。它的成因既有周期性作用影响,也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长期因素和近期因素交织到一起了。长期因素就是 2000 年以后,中国的 GDP 出现了长达十年的、两位数的增长,这是中国的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即高速增长、低通胀,生产能力明显增长。

管:生产能力十年间两位数增长,这是了不起的辉煌成就。生产能力的空前增长,其核心在 TFP,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现在在方式转型应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认为过去的伟大成就似乎是粗放型取得的,这是不对的。理念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郑:生产能力增长,这是事实,我国 200 多种产品生产能力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超过美欧日总和。钢铁产量中国是世界第一,河北省是世界第二,唐山是世界第三,唐山市的迁安县是世界第五。这表明 2000 年以后,我们靠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带来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这成了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近期来看,主要问题还是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疲软,所以我们出口增长受阻。长期矛盾和近期矛盾结合到一起,造成需求不足。解决这个矛盾从根本上讲,还是靠转变发展方式,当然,宏观调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现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在研究、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如何以顶层设计思维,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搞好宏观调控,解决好一系列重大问题,至关重要。鉴于此,近日本报主编管益忻教授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研究员进行了一次对话,现整理如下。

要注入新思维。

转变发展方式是十七大提出来的。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是扩大消费;第二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第三是加快科技进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进行改革,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是释放消费潜力,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还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时间可能需要长一点,因为分配结构的调整需要税制改革。第三产业“营改增”的改革现在看效果很明显,去年以来,我们的增长速度比较低,但是就业没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是依靠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改革才刚刚开始在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全面推开,所以它的效应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如果完全发挥出来的话,改革将会释放出巨大的就业需求。我算过一笔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是 46%,比较高了,但是就业人数只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 34%,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60% 低得多。发展中国的平均水平是 50%,我们离发展中国家水平还差 16 个百分点,不是一般的差。如果通过“营改增”的改革,第三产业的税赋和第二产业拉平了,把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那么就可以多创造一亿一千万个就业岗位。这么大的就业容量空间还有待于发挥。

以原创为本是转型升级的关键

郑:第三个就是我们自主创新的形势。这几年,我国发明专利的申请量连续两年是世界第一,超过美国了。国际专利申请量,去年是世界第二位,而且跟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2010 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是我们的 6 倍,2011 年是我们的 38 倍,2012 年降到 26 倍,去年差距也在缩小,估计是一点几倍。如果这样的话,再有三年时间,我国国际专利申请量有可能超过美国。现在美国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

管: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原创不力。发展方

式就是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发展方式就是颠覆传统资源配置模式,真正使之转型升级。这特别需要原创性的新型的创新。所谓工业化就是加工,而加工包括三方面:加工物质、加工信息、加工价值观。文化创意产业、企业文化都是加工价值观的,如果把“三个加工”都算进来,综合起来考虑,那么资源配置——起码从理论上说——其运作模式就不同了。从这角度看,在实际上可能在统计指标上有一系列指标数据没有涉及,因而现在的科学性就有问题了。刚才说的知识产权,当初不是落后于美国吗,如果把这块算上,可能咱们赶上美国的时间还会缩短。以原创为主导需要抓住关键环节。

郑:创新这一块儿,整体开发得比较好。但要真正以原创为主导,这个创新就要抓住关键,下大气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从所有制这方面来看,原来讲民营企业是生力军,现在已变主力军了。民营企业申请专利的总量已经占到 70% 左右,而国有企业的潜力发挥的不好,国资委前年下发了《关于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要好好落实,改变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办法,使国有企业的潜力真正发挥出来,我们的创新就更厉害了。第二个就是在地域上,深圳申请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的 47%,而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沈阳这些城市,其创新的资源都比深圳要好要多,研究机构、大学、院士、教授都比深圳多,但专利申请、创新实绩大大落后于深圳。为什么会这样呢? 各个地方应该比照深圳找差距,在创新文化、创新机制等方面找差距。如果其他地方特别是这几个大城市,科技资源集中的城市要是都能赶上深圳的创新成就,那我们创新的潜力就更增强了。还有一个就是领域上,我们在通讯这一新兴领域申请的专利比较多,传统的领域还不行,比如石油化工、集成电路还不行。现在石油化工每年进口的产品约 2000 亿美元。石油化工产品有一万多种,我们只生产几百种,主要是研发不行,所以要对创新进行激励。现在我们研发投入已经超过 GDP 的 1%,接近 2%。企业应成为研发投入和创新的主体,这是非常好的。创新的第四个动力就是城市化。城市化越来越重要,因为城市化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可以拉动创新,这是未来十几年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系统。最近国务院总理提出了“三个一个亿”作为城市化抓手,一个是沿海地区抓好一亿农民工市民化;第二是中西部再吸纳一亿农民工进城;第三就是关乎一亿人的现有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的改造,总理讲这个讲得很好,讲到点子上了。如果我们抓好这些城市化抓手,就会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这可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所以在这四个方面要加快改革,特别是第一个,消费这一块问题严重。因为现在投资跟消费的比例失衡,这几年这一比例不是更优化了而是更恶化了。最高的一年投资率达到了 48%,最终消费率下降到 47%,投资率比消费率还高一个点,这



●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教授

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恐怕在世界上也少有。由于消费占比上不去,投资不得不往上涨。这个结构调整比较难,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破除“路径依赖”

郑:从近期来看,可能还得靠投资拉动,但从根本上来说应该主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管:新立主任,最近据汤森路透报告格林斯潘对中国的吐槽,他讲现在世界上 100 个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比较好的公司,没有一个是中国的,美国 45 个,日本有多少,中国是零蛋。现在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量上都没问题,就是品牌、文化内涵、核心东西,特别是像汽车发动机等不行。还有,我们转型升级的发展一定要破除“路径依赖”。如关于投资和消费关系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老犯的一个毛病就是高积累低消费。高积累即高投资,大大地挤压了广大民众的消费。现在搞市场经济了还有这个问题。

郑:现在国内汽车消费量很大,但是 OEM 占比太大,OBM 尽是洋人的。诸多车展几乎都成了万国汽车博览会。我们的品牌和创新不如韩国,韩国创造出了许多世界名牌。咱们还没创造出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主要是急于求成,高投资率,低消费,结果欲速则不达,经济发展平均速度只有 6% 多一点,人们的消费水平年均增长只有 1% 多点,结果造成了资金大量的在投资领域沉淀,所以我们消费水平低。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八十年代,对这个情况进行调整,就是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轻纺工业率先改革率先放开,这样一来,用十年的时间我们结束了工业发展的困局。

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我们发现生产出了问题,1980 年底的经济学界群像会——在北京西山开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研讨会——是一次关于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大反思、大探索、大讨论的会议。这实质也是对两大部类关系的探讨。就是经济学界一次生产目的大研讨。400 人与会。于光远先生主持。我参加了那个会,你也参会了。

郑:当时,理论上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过度、片面地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经济学家们反思了这个问题,包括董辅初 20 世纪六十年代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推导所谓列宁的再生产公式。而在中国,是先生产钢,钢用来生产机床,机床量大了再用来生产钢。结果成了钢和机床之间的循环。第一类内部自己循环了! 后来经过八十年代的大调整,情况改变了,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很快,成为老百姓受益最多的时期。那会儿工资也涨了,老百姓买家电,买冰箱,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又积累了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又相当尖锐,所以又需要大幅度地进行调整。马克

思在《资本论》里讲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广大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有限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在我们这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解决不了这个矛盾,所以就会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解决不了就埋葬资本主义。后来西方发达国家也从《资本论》里得到借鉴,特别是北欧的一些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这个矛盾,一个是搞社会福利,搞福利国家,搞公共服务,第二个是搞经济预测。就这两条措施,人家生产周期性过剩的危机已经缓解了,或者说开始消失了。但它现在走向了反面,消费过度,特别是公共服务的保障超过了财力的承受,所以它要延长退休年龄,减少退休金。退休金一减少,老百姓就上街闹事,没办法。我们现在正好是相反,东西多得很,但是没有消费能力。我算过一笔账,我们用五年到十年时间,把最终消费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把居民消费率提高 15 个百分点,现在居民消费率只有 36%,提高 15 个百分点,达到 50%,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六五”时期,居民消费率曾经达到 53%,最终消费率达到 60% 多,如果能达到六五时期的那个水平,那么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 15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可以提高 10 个百分点,这样,就相当于每年用于投资和出口的 7 万亿到 8 万亿的商品消费,转变过来让我们老百姓消费。现在我们一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 20 多万亿到 30 万亿,要再增加个六七万亿甚至到 8 万亿,那消费水平提高多少? 要真正把结构调整过来,这才叫以人为本。现在就是发达国家解决了矛盾,我们还没解决,因为我们没有解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因为现在和过去的改革不一样,现在投资和消费约束机制建立起来了。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受工资水平的制约,工资水平受各个企业的制约。政府公务员占很少的一部分。所以没有解决消费的出口,现在关键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还有就是城乡之间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管: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个大问题。像金融行业,年收入是 9 万多,一般的工薪阶层是 4 万多,还有低收入是 3 万多,金融那一块相当于最低收入的三倍。

郑:金融行业现在存在的问题很大。还有一个就是调整收入结构、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如果说个人消费领域是供过于求,或者供求平衡,而公共产品则是供给不足。比如说,城市当中最典型的是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本来是要政府提供的,但提供不了。因为没有形成生产机制,为生态文明做出贡献的、治理污染的吃亏,不治理污染的赚钱。还有城市里的交通拥堵,还有敬老院、幼儿园、职业教育,这些都是供给不足的。在北京你打电话打三天,养老院都找不到床位。找个幼儿园你得赞助几万元,这些事,要是政策放开的话,不就可以解决吗? (下转 02 版)

现代市场经济的支柱

■ 唐宗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国经过三十余年艰辛曲折的改革,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但是,正如江春泽教授所指出,“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远未完成”,干部和民众大多不了解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体系,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种种扭曲现象和弊端。

这就是说,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离现代市场经济还很远。依我浅见,产权保护、契约精神、公民社会、社会保障、法治秩序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支柱。而我国在这些方面都十分欠缺。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中弊端丛生的体制根源。

市场经济是交易经济,即产权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交易的经济,市场交易本质上是产权的交易。因此,产权界定与保护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我国目前不仅产权不清晰的领域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致使贪污污吏利用权力侵占公有财产有可乘,而且任意侵害独立主体的产权的现象更层出不穷,包括直接侵害和变相剥夺。

市场交易是通过契约实现的,守约履约是市场得以正常交易的前提。可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的人们,缺乏契约观念。我国当前市场秩序混乱异常,坑蒙拐骗猖獗,违约毁约现象司空见惯,正是契约精神缺失的表现。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and 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转变政府职能,使之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相适应。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同时,不能忽视社会功能对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它是政府和市场都代替不了的功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部门协调发展,才能确保经济、社会的平衡、稳定与和谐。因此,公民社会的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抑制公民社会发展是与现代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

社会保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支撑现代市场经济持续运行的社会安全网。我国社会

保障体系近年正在加速建设,但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很大的距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需要政府和公民社会共同努力。

市场经济和法治是不可分割的。市场交易和上述产权保护、契约精神、公民社会、社会保障都离不开法治的维护。法律要能约束一切人,不仅约束民众,首先要约束政府。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法治不仅意味着政府依法行政,而且政府依以行政的法律本身必须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因此立法者也要受宪法和相关法律的约束。在我国,法治建设显然任重道远。

总之,一句话,我们还必须持续地坚持不懈努力,才能建成现代市场经济。

江春泽教授的新著

《猜想与求证》,从国内外

理论与实践的系统考察与

反思,有说服力地论证了

计划经济的不可行和市场经济

是现代社会经济发

展的必由之路。这是她数十

年孜孜不倦的研究成果的

结晶,是一部不可多得

的力作。